

政治參與和民主價值取向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縱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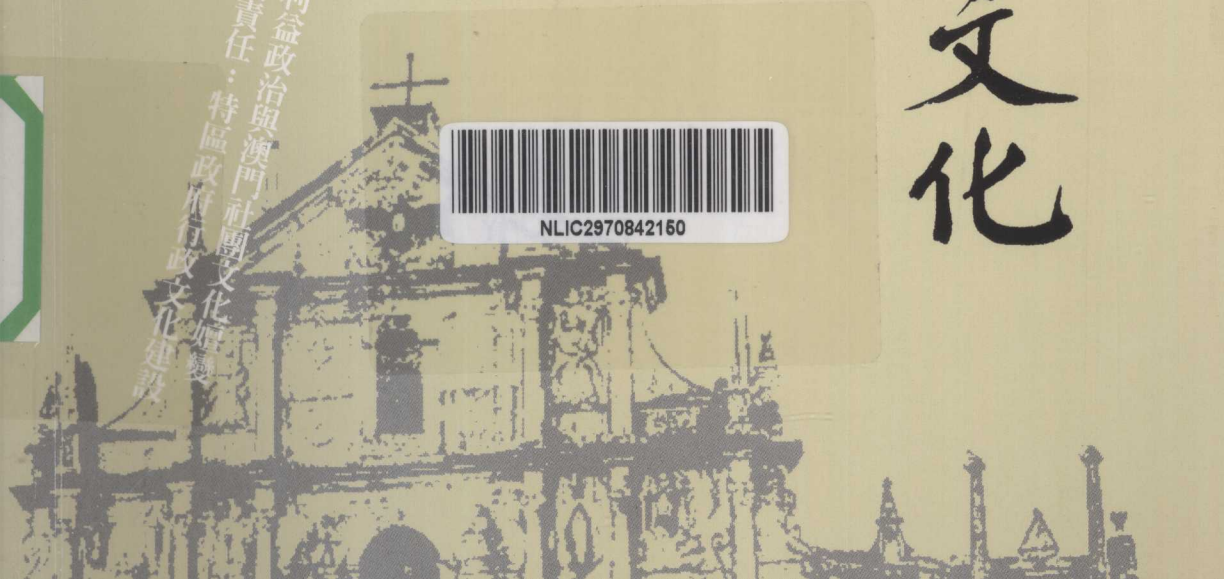
◎ 余振 婁勝華 陳卓華 著



NLIC2970842150

庇護主義、利益政治與澳門社團文化嬗變
選舉文化
民本、法治與責任：特區政府行政文化建設

對政治體系的認知、評價和情感取向
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對公民教育的啟示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縱向研究

◎ 余振婁勝華 陳望華 著



NLIC2970842150

責任編輯 陸明天 向婷婷
書籍設計 鍾文君

書 名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著 者 余振 婁勝華 陳卓華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 次 2011 年 12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68 × 230 mm）30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62-3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序

20 年前，本人任教於澳門大學，與同事劉伯龍和吳德榮兩位先生合作，以入戶訪談方式，對本澳 18 歲以上永久居民進行問卷調查，研究探討澳門市民的政治文化和選舉文化。研究成果以專著形式出版（《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基金會，1993 年）。20 年來，我一直關注澳門政治文化及社會發展，並進行有關調研工作，研究成果亦已於中外學術期刊或論文集發表，但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以專著形式出版。

2009 年 9 月 20 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舉行回歸後第三次立法會選舉。藉此機會，我與澳門理工學院兩位同事婁勝華教授和陳卓華副教授合作，以隨機抽樣及電話訪談的方式，於立法會選舉期間，對本澳 18 歲以上永久居民進行問卷調查。為了保證研究成果的可比性，2009 年的問卷設計與 1991 年問卷大同小異，只在內容上因政經環境的改變而略作修改。為了方便學者專家或對研究課題有興趣的澳門市民查閱，我們決定將研究成果以專著形式出版。

本書相比 20 年前的專著，結構上有所調整，主要是增加了特區行政文化和社團文化兩章。新增兩章由婁勝華執筆。其餘章節由我執筆，第一章緒論的文獻資料收集及部分撰寫工作由澳門大學博士研究生姜姍姍負責。2009 年的問卷調查由陳卓華統籌負責。本人並負責全書的統稿工作。

我們有幸生活於一個相對和平和穩定的時代，見證祖國和澳門數十年來的變遷。中國自上世紀 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國力穩步上升，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國民生活面貌大幅改善，進入小康社會。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亦與日俱增，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及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期間，都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強大祖國的支持下，回歸後

的澳門，亦很快從回歸前夕的衰退復甦，經濟重新踏上上升軌道。2002 年的賭權開放及 2003 年內地“自由行”政策的實施，更加速了澳門經濟的發展。2006 年澳門的博彩業收入首次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同年，澳門的人均年收入超越香港，排在亞洲前列。雖然經歷歐文龍受賄案的打擊，澳門特區的經濟增長及社會發展並沒有停下來，繼續穩定高速前進，2010 年的博彩業收入已經四倍於拉斯維加斯。特區政府亦以現金分享方式及其他利民政策還富於民。20 年來，我們有幸見證了澳門由經濟陷入衰退，轉變到高速發展，並進入太平盛世的大時代變遷。

在經歷大時代的變遷下，澳門人的政治文化心理素質有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呢？回歸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澳門人的參政議政素質有沒有明顯提升呢？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文化有沒有從傳統的“官本位”成功轉型為“以民為本”的服務型行政文化呢？以底護關係聯繫社團及其成員的傳統社團文化有沒有蛻變為民主、平等、開放的現代社團文化呢？澳門的公民教育應該如何適當調整，才能肩負起培育下一代“澳人治澳”的人才的責任呢？以上問題是本研究課題的題中之義。但限於時間和能力，我們不可能做到題無剩義。希望本書能夠拋磚引玉，吸引更多學者專家及澳門人關注澳門的政治文化及民主政治發展，並延續及深化有關學術研究。

蒙各方的大力支持，本書能夠如期出版。我們特別感謝澳門理工學院給予的科研資助，澳門基金會對本書出版的贊助，以及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的鼎力支持。我們對在本次研究的不同階段，給予我們很大幫助的理工學院同事、學生及社會人士，在此謹致謝意。我們更十分感謝香港三聯書店同意出版本書。

最後，我們非常感謝中國當代書法泰斗黃雁先生為本書題字。

余振

2011 年 5 月

目 錄

序 __ III

第一章 緒論 __ 1

第二章 對政治體系的認知、評價和情感取向 __ 37

第三章 政治參與和民主價值取向 __ 75

第四章 選舉文化 __ 117

第五章 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對公民教育的啟示 __ 157

第六章 民本、法治與責任：特區政府行政文化建設 __ 185

第七章 庇護主義、利益政治與澳門社團文化嬗變 __ 225

第八章 結論 __ 247

附件 __ 263

第一章
緒論



1.1 導言

眾所周知，澳門政府並非普選政府。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歸祖國之前，它的正式和法定權力源自葡萄牙里斯本：澳門總督是由里斯本委任的。不過，跟鄰埠香港不同的是，澳門的主權從來沒有割讓給葡萄牙，1887 年的中葡條約只將澳門的管治權移交葡國；澳門的邊界從來沒有正式由中、葡兩國界定。澳門這個幾乎完全沒有自然資源的小港，日常所需包括最基本的食水及糧食都是倚靠中國內地的供應。因此，雖然由葡國管治，澳門的自主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於中國政府的。事實上，澳門政府一向沒有能力控制由內地遷入澳門的人口。直至 1991 年，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澳葡政府才在珠海—澳門邊界設立海關檢查站。

根據 1991 年的人口普查，澳門大約有固定居民 354000 人。¹ 其中大約 97% 是華裔居民，2% 是土生葡人，² 1% 是由里斯本或葡國前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果阿來澳工作的葡籍人士。土生葡人一般在政府機關工作，是中層領導或主管人員的骨幹；外來的葡萄牙人則多担任上層領導與主管的職位。可以說，他們都是澳門的政治精英。可是，土生葡人跟外來葡人並不是水乳交融、毫無芥蒂的。很多土生葡人能說流利的廣東話（雖然很少能讀或寫中文），對澳門有強烈的歸屬感，視澳門為家。他們不容易亦不大願意融入外來葡人的圈子中。事實上，回歸前澳門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葡人社交圈子——土生葡人和外來葡人。不過，他們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無論土生葡人或是外來葡人，都很少與本地華人的社交圈子來往。因此，澳門的大眾政治文化很少受到土生葡人或外來葡人文化的影響。

澳門的華裔居民大多數是由毗鄰的廣東省，尤其是中山市遷徙來的。其中亦有相當一部分，估計大約十萬人（約佔澳門人口四分之一），是從福建省遷來的。事實上，現居民中很少是原澳門居民的後代。當葡萄牙人於 1553 年首次踏足澳門，他們只發現幾百個當地居民。³ 由於大量的華人

從鄰近的縣鎮遷入澳門，20 世紀初澳門的人口超過五萬。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發生於 1940 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某種原因，澳門沒有被日本人佔領。大量的內地及香港人湧入澳門，澳門成為他們的避難所。據估計，戰時的澳門人口高峰期超過 30 萬。⁴ 抗日戰爭勝利後，澳門人口急速下降，很多人遷回內地或香港。據估計，1950 年澳門的人口大約為 18 萬。⁵

1960 年代及 1970 年代澳門的人口幾乎停滯不前。自然人口的增長，被相繼離開澳門到香港或國外謀生的年青人所抵消。不過，到 1970 年代末期，由於中國內地放鬆移民政策，澳門的人口再次飆升。據估計，僅 1979 年就有大約四萬合法移民由內地遷入澳門。整個 1980 年代，合法和非法遷入澳門的內地移民總數超過十萬人。⁶ 不過，大約四分之一的新移民最後遷往香港或海外。因此，如上述，澳門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裡上落很大，極富流動性。事實上，1990 年代初，不足四分之一的澳門成年人是本地出生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紀 90 年代澳門的政治文化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縮影，尤其是廣東和福建兩省的文化。到 21 世紀，由於自然人口的增長，而新移民人口相對減少，現今約一半的澳門人是在本地出生的。

1.2 阿爾蒙德（Almond）和弗巴（Verba）的模式

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於 1956 年首先採用“政治文化”一詞，並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傾向”。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澱，深藏在我們心中並潛移默化地支配着我們的政治行為。阿爾蒙德和弗巴（Verba）在《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公民政治文化即一個政治系統內的個人對於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可用認知、情感和評價三個概念來說明。⁷ 這三個取向的對象或目標有四個：（1）整個政治體系；（2）體系的輸入功能

（在政策流程中，所有個人、團體和程序對政府的需求和支持）；（3）體系的輸出功能（所有政策執行的內容）；（4）自我的政治角色（指個人作為政治系統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的知識及信仰）。⁸

阿爾蒙德和弗巴根據公民對政治體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功能以及個人擔任的政治角色的認知、情感和評價的狀況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

（1）“地域型文化”：指民眾對於政治制度、政策和其他政治目標的認知極為薄弱，甚至認為完全無法加以影響。具有這種政治文化特徵的社會大多仍處於部落、地方或村落文化狀態。（2）“臣屬型文化”：指民眾對於政治系統及其輸出有強烈的認知，但是僅微弱地感到此系統的重要性，而且個人的政治效能感很低。在這種政治文化氣氛下，民眾的政治角色尚只是臣屬地位，或“順從者”，而不是自主地位。（3）“參與型文化”：指社會的成員對整個系統、政治和行政結構及運作過程有強烈的認知和態度取向；他們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參與就能夠影響國家事務。但是，阿爾蒙德和弗巴強調，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只是某一種純粹形態的政治文化，而必然是兩類或三類文化的綜合體。當然，必有一類居主導地位，構成該政治系統的主流政治文化。⁹

據阿爾蒙德和弗巴從英、美、德、意、墨（墨西哥）五國的調查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真正能構成“安定的民主”（stable democracy）的政治文化必然是將傳統與現代兩類文化加以混合的文化。任何徹底摒棄傳統政治文化而重建現代政治文化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優良傳統與現代混合的文化被稱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組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說：有政治活動，但不致於去摧毀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入，但卻是溫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總之，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¹⁰

這本書採用阿爾蒙德和弗巴對政治文化的定義及其理論模式。我們很想知道，通過實際調查研究，澳門是否具有“公民文化”。換言之，澳門有沒有適當的文化土壤以實行一個“安定的民主”政制呢？

1.3 西方學界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¹¹

西方的社會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向來有濃厚的興趣。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對這方面的研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白魯恂的研究興趣主要是 1949 年後的中國政治。白氏認為政治文化是解釋中國政治現象不可或缺的元素，因為意識形態，尤其是帶有濃厚道德觀念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政治上一向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皇時代，儒家思想之所以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是因為“它符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和一般老百姓的家庭及家族倫理規範”。¹² 因此，在傳統中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主要是受儒家的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思想影響。同樣地，在當代中國，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被領導者和中國人民所接受並被視為最高的道德標準。白氏認為，中國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懂得利用某種含有強烈道德意味的意識形態來鞏固他們的統治，使其政權合法化。¹³

漢學家墨士格（Thomas Metzger）則認為在中國政治文化中，道德標準與實際政治權威架構之間存在着緊張的關係。下屬對上級、擁有政治地位者的服從不是絕對的，而是根據在位者有否依據道德標準辦事而定。¹⁴ 不過，白魯恂不是不知道潛伏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緊張關係。白氏認為中國有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傳統中國，有着兩極的社會形態：一端是主流正統的儒家理論，另一端是反主流的道、佛和民間通俗的信仰。在白氏看來，毛澤東繼承了傳統的反主流或反叛文化，而鄧小平則較為溫和與低調，承繼了主流的儒家或士人文化。¹⁵ 白氏企圖用兩種文化論去解釋動盪的毛澤東時代（含“文化大革命”）和強調實事求是的鄧小平時代。白氏認為毛、鄧兩個時期都同樣具有“中國特色”。¹⁶ 很多人未必同意白氏對中國政治現狀的分析，但是他對中國傳統潛伏着的矛盾的精闢觀察，卻獲得很多漢學家的同意。

白魯恂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內地的政治制度中，潛伏着權威危機。根

據白氏的觀點，當一個合法政權的文化和心理基礎受到現代化過程的衝擊，權威危機就會出現。¹⁷ 白氏提出警告，如果現政權的中國領導人，不吸取傳統中國統治者的教訓，繼續漠視人民的困境和要求，某種權威危機就會爆發。中國人民最終會唾棄一個顛覆無能的政權，雖然傳統上他們對權威依賴和崇拜。其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亦指出在中國文化中存在着傳統與現代的不協調現象。¹⁸

白氏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下列主要特徵：¹⁹

(1) 一個由政府精英控制的、自足自給的政治體系；一般公民或非官方人士對政府的影響力很少。

(2)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主從關係，類似父母和子女之關係。

(3) 強調道德說服力的功效和修身克己的重要性。

(4) 強調融洽相處，缺少官方認可的“反對黨”。

(5) 缺少政治上“平等”的觀念；以“萬能政府”為理想型的政府。

(6) “朋友”和“敵人”之間界限分明。

(7) 傾向附和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

(8) 特別注重人際關係。

(9) 強調團結和安定。

(10) 意識形態在政權的認可性上扮演重要角色。

(11) 政治上通權達變、因時制宜。

(12) “兩種文化”的特徵。

(13) 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感到自豪。

(14) 相信歷史循環論，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概念。

很明顯，在白魯恂眼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十分酷似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說的“地域型文化”和“臣屬型文化”的混合。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缺乏現代政治“參與者”的觀念和傳統。換言之，白氏認為，中國政治文化並不適宜民主政治的發展。同時他認為中國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有其永久性及不可改變性。當然，白氏並不是唯一強調中國文化的連續性的學者。事

實上，大多數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都同意中國文化的要素在過去幾千年來一脈相承，很少改變。

很少人會懷疑白魯恂對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成就和貢獻。不過，白氏自己亦承認，他的研究成果並不是基於實證調查的工作上，而是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和推測。²⁰ 白氏並沒有在中國內地進行過任何有系統的實地調查工作。他主要依靠他於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對內地難民的零星、缺乏系統性的訪問，和同期在馬來西亞對在馬華人的訪問資料。他的訪問對象代表性因此不夠，未能真正反映出中國內地的政治文化。白氏過分強調政治社會化對青少年的影響和傳統中國家庭的角色，忽略了自 1949 年以來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家庭所發生的巨大改變。同時，白氏並沒有從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經濟制度的視角來解釋中國政治文化。所以，白氏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欠缺全面的瞭解。他用政治文化來解釋中國內地的政治現象，使人覺得如事後諸葛，欠缺說服力。

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運轉需要相應的文化條件，而過去那種解釋（Interpretive Approach），如上述白魯恂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普遍認為，西方式民主在中國注定難產，因為中國政治文化具有明顯的威權主義特徵，並且政治冷漠，打擊異己，這些都與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文化土壤不相匹配。然而，這些結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中國政治文化的真正面貌究竟是什麼？儘管自阿爾蒙德開始，有關政治文化的實證研究方法在西方已經逐漸發展成熟，但直至上世紀 80 年代末，鮮有將其運用到中國政治文化研究中來。而對政治文化展開系統的經驗研究，是理解當代中國政治變遷的核心，其重要性早已被很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所強調。²¹

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1990 年代以來的中國逐漸由封閉單一變得開放多元。社會政治環境的相對寬鬆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機會，讓西方學者來到中國實地調研，從事經驗研究，從而大大提高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1990 年，當時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大學政治學系的史天健教授等人與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合作，首次運用公民文化的研究框架在全國範圍

內展開大規模抽樣調查，從三個維度考察了中國政治文化，即中國人對政府影響力、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容忍的看法，並將其與同時期的歐美民主國家進行了對比研究。²²此後，史天健教授在這一領域陸續出版了諸多文章和著作，包括《北京市民的政治參與》²³、《中國人的文化與民主觀》²⁴、《中國大陸與台灣有關政治信任的對比研究》等。²⁵

除了全國性的調研，首都北京也吸引了一批學者將其作為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的個案對象。例如，1987年夏天，以1240名北京市民為樣本的調查數據表明，中國政治文化並非人們想像中的鐵板一塊，而是存在一定的政治多元，部分群體如政治激進派和樂觀派既熱衷參與政治，又與主流價值保持距離。²⁶美國田納西大學的鍾揚教授等人也於1995年和1997年在北京市進行了兩次問卷調查，考察了北京城市居民的政治興趣、民主觀念、政治效能感、對經濟改革的認識和對政府績效的評價。調查發現，偏於保守、強調秩序和穩定、精英和權威取向仍然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總體特徵，同時，雖然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性，但並未減弱人們對政治的關心程度，深化政治改革仍然是普遍的社會期望。²⁷不過，由於北京這座城市非常特殊，所有以北京為個案的研究結論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是否能夠呈現出中國政治文化的整體面貌，有待驗證。

另一項有趣的研究把中國諸多省份劃分為現代主義（modernism）、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地域主義（parochialism）和分離主義（separatism）四大類型，更仔細地考察了省份認同與政治文化的關係²⁸，使得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擺脫了以往那種全盤式的論述方式，更加真實、全面地展示出幅員遼闊的中國本應具有的多層次的政治文化面貌。美國普渡大學的洪朝輝教授指出，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尤其是隨着權力資本經濟的盛行，中國社會已經初步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權力資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這種政治文化形態根植於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和中國共產黨文化（Communist Culture）之中，並具有三個基本特徵：（1）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本的有效結盟；（2）社會參與的被動性、短期性和有效性；

（3）社會政治寬容的選擇性。²⁹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後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關注，還常常與民眾抗爭（popular protest）研究密切相關。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迅速重組，利益關係不斷變化，社會衝突的數量激增且類型各異，群體性事件進入高發時期。據統計，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從1993年的0.87萬件增加到2005年的8.7萬件，2006年更超過9萬件。³⁰在城市，業主維權、工人抗議、保育運動、網絡動員等各種新興的社會現象³¹，都從不同的角度顯示了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以來中國政治文化所發生的潛在變化。在農村，伴隨着1980年代後期以來村民自治的實施，農村基層民主建設逐漸成為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內容。

按照西方學界的觀點，民主是以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為前提的。因此，很難想像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較低的中國廣大農村，實行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³²為核心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實踐，給西方既有的政治文化理論打上了問號。中國農民的政治文化具備什麼特徵？是否與民主政治相容？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如何看待民主和經濟改革？弄清這些問題，對於理解中國的政治發展以及民主化進程至關重要。2000年，鍾揚教授實地調研了江蘇省20個村落。調查發現，農民對於民主和經濟改革的態度並不像人們一般認為的那樣保守，他們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態度甚至可以與北京城市居民相提並論。換句話說，中國農民並非民主政治的絆腳石，事實上，他們已經為實踐民主政治做好了準備。³³不過，該研究是以比較富裕的江蘇省農村為對象，對於相對落後的其他農村地區而言，研究結論或許並不適用。

由於政治放權，市場經濟的深化和社會流動的加劇，農民採取集體行動的政治機會結構逐漸形成，使得集體上訪成為一種普遍且有效的農民抗爭方式。³⁴李連江和歐博文教授通過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劃分出當代中國農民的三種類型，即順民（compliant villagers）、釘子戶（recalcitrants）和刁民（policy-based resisters），並着重考察了刁民這一類具有與傳統中國

農民不同文化特徵的群體，如何利用法律、政策和其他官方資源進行合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³⁵ 這種基於政策的新型抗爭方式（policy-based resistance）的形成和蔓延，³⁶ 正在影響中國農民關於政府責任、公民權利等一系列問題的看法，進而預示着農民政治認同和農村政治文化的深刻轉變。³⁷

1.4 中國內地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1949 年至 1980 年代初，內地學者很少從事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據統計，在 1919–1949 年的 30 年間，在中國內地出版的有關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史的專著一共有 170 種；而在 1949–1979 年的 30 年間，只有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專著在內地出版。³⁸ 自從 1949 年以來，“文化史觀”被排斥而代之以“唯物史觀”。任何有關“文化”的研究課題都被視為政治敏感，這種情況一直到 1980 年代初期，當中國政府採取對外開放政策和較為寬容的學術政策後才有所改變。

對於 1919–1949 年期間有百多種有關文化的專著面世，我們並不感覺到驚訝。周策縱教授認為，1919 年的五四運動主要是現代中國的一次知識分子革命。³⁹ 當時的知識分子充滿愛國的熱情，對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有無限的憧憬，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而改變中國。一些五四運動的健將，如胡適、蔡元培等，鼓吹全盤西化；較為保守的如辜鴻銘、章士釗等則強調尊重傳統，認為一個新的中國只能建立在過去的文化傳統上。另外一些較為激進的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則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雖然他們的思想、文化取向大不一樣，他們卻有一共通點：在努力尋找一個正確的政治和文化方案去救中國。這種五四精神繼續影響了以後好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